

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 逻辑前提、内在根据与实践要求

李 征¹ 刘建军²

(1.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3; 2.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摘要]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包含丰富规定性的总体性精神样态,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它派生和孕育出作为具体环节和特殊形态的精神谱系,并从精神之维内在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立足新时代境域,深入领会和切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依循着由“知”到“行”的总体理路,阐明其从何而来即以生成逻辑为本质规定的逻辑前提,揭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根据,并在此基础上从体制机制维度出发制定恰当的弘扬举措。只有将理论层面即“解释世界”的伟大建党精神,转换为现实层面即“解释世界”的力量,才能在知行合一中真切把握其本真要义和根本旨趣,进而为新时代伟大工程的建设 and 治国理政的推进提供精神指引。

[关键词] 伟大建党精神;逻辑前提;内在根据;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21)06-0066-08

DOI:10.14119/j.cnki.zgxb.2021.06.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大命题和概念,并从“知、情、意、行”四个维度深刻揭示出其最本真的内蕴涵和具象化形态。伟大建党精神概念和命题的现实出场,既意味着熔铸在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百年历程中的精神得到总体性把握,也意味着这一精神本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彻底激活和唤醒,实现了从自在形态到自为形态的跃迁。立足新时代境域,内在把握和真切理解伟大建党精神,不仅需要从历史实践上升到理论探讨即从实践具体上升到理论抽象,在理论层面对其概念和内容等基本规定进行系统阐发,而且需要从理论抽象回归到实践具体,释放其指导实践的磅礴伟力。

因此,在理论维度系统阐明伟大建党精神之本质规定的基础上,从实践向度内在地给出恰当的弘扬与实践进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前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透视伟大建党精神的出场逻辑,揭示伟大建党精神是在何种理论、实践和文化源泉的浇灌下开出的“精神之花”是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前提。

第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毒剂和现代性的诊疗学方案,其内含的科学精神、实践精神、为民精神和斗争精神,不仅构成

[收稿日期] 2021-09-10; **[修回日期]** 2021-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研究”(21VSS017)。

[作者简介] 李征,法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建军,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的精神源泉,并使其内具天然的使命型政党禀赋,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得以现实出场的理论根基。以主张解构闻名于世的哲学家德里达就曾指出,如果“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同样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有伟大建党精神,因为,“没有理论根基的精神是难以立足的,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和前提”^[2]。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纷繁荒杂的表象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在资本主义建立起普遍统治的境况下真切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真理、信念和具体规律,而“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3]。这种科学性和真理性造就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另一方面,与满足于在书斋中坐而论道的思辨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是起而行之的实践者。他不仅把自己的哲学叫作“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而且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头脑的激情”和“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6]。这种实践性造就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与此同时,虽说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家,但他的革命家形象极其鲜明而突出,其学说不仅内蕴着革命的结论,而且充满了革命精神。为了改变人民受资本逻辑统治的命运,马克思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去,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可以说,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更是革命家。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和领会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的深意了。这种革命斗争性造就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此外,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萌发了为人民幸福奋斗的强烈使命感,之后他又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被誉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永恒乡愁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与维护少数人私利的资产阶级政党

不同,“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这种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无产阶级政党首位的鱼水情怀,造就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第二,文化逻辑: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渊源。任何一种切中时代本质的思想理论成果都是在汲取人类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亦不例外,它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不断汲取养分,又离不开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滋养,是二者共同孕育的结果。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内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性实践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文化标识,是一切民族精神的“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9],就不会有任何一种民族精神的诞生。伟大建党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内蕴着最鲜明的文化的基因,凸显着最真切的价值追求。首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真理观,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朝闻道,夕死可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理想追求相一致。其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担当使命观。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犬”亦不肯放弃初衷,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人先贤的嘉言懿行无疑最本真地诠释了使命担当精神。再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奉献牺牲观,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斗争旨趣相耦合。最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观,与孔子“民为邦本”的仁政思想,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荀子的水舟之喻以及“临患不忘国,忠也”的古训内在贯通。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内在资源,伟大建党精神内蕴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其精神形态的表达和时代升华。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外源。从古至今,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彼此交流融通中走到今天的,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成果也都是在彼此借鉴中生成的。列宁曾指出,作为资本主义解毒剂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生成并散发出全球性的耀眼光辉,正是由于它没有拒绝人类不同文明中的有益成分,而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0]。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的伟大建党精神亦是在吸收融合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生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走出国门,学习借鉴国外的新鲜思想和文化成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更是始终以高远的全球视野和宽广的胸襟审视世界大势,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

第三,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基础。伟大实践造就伟大精神。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作为一种有别于物质存在的精神样态,伟大建党精神归根到底隶属于思想观念的领域,是思想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样态的出场都离不开一定的实践奠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并不是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是感性对象活动的实践层面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1]。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深刻地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而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生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伟大实践的内在奠基。换句话说,在历史展开过程中创建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实践,在思想理论层面的集中映现就是伟大建党精

神。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起反抗,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救亡方案相继涌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接连发生,虽说这些方案和运动发挥了不可忽略的积极奠基作用,但都没有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切中时代的本质,最终难逃失败的历史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4]。在此特殊的时代境遇中,思想开放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建党的伟大实践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先后发表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介绍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事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蔡和森、夏明翰等人则不惧反动势力的威胁打压,时刻保持高度的纪律性和自律性,坚守信仰、勇于斗争。可以说,建党实践本身就是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最具可能性和最好的实践方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担负起为民族谋独立、国家谋富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伟大建党精神正是来源于伟大建党实践,是伟大建党实践的观念映现和精神总结。

二、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根据

如果说阐明伟大建党精神的出场逻辑是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前提,那么给出其内在根据就是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基础。

(一)价值凸显: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性

伟大实践淬炼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指引伟大实践。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优良作风和高贵品格,具有无可比拟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仅是彻底“掌握群众”“说服人”的思想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思想动力,更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精神源泉。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伟大建党精神在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指引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首先,在理论层面上,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图谱,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找到了源头活水。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畏艰难、浴血奋战,形成各具时代特征的伟大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斗,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大无畏的担当精神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艰苦奋斗,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以敢为人先的政治勇气破除桎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台阶,形成了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等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形成了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场的伟大精神各具时代特色和特殊内涵,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特定时期内具特定内涵的精神形态背后一以贯之的公共文化基因,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一直是一个处于被遮蔽状态尚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只有搞清根与枝、源与流、变与不变,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精神谱系的意义,“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15]。因此,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命题,是运用“从后思索”方法进行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寻根,既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找到了源头活水,也有利于继续发挥各种精神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家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享受,但人们的精神家园却不可避免地被技术“裹挟”,卷入算法的洪流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6]。如此一来,人们就从诗意栖居的理想状态中被驱赶出来,面临着失去精神家园的危险。伟大建党精神的出场为构建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有效资源,其所具有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求真精神,正是人们在认知之维所需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其所具有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践行精神,正是人们在行动之维所共同需要的思想指引和理论指南;其所具有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斗争精神,正是人们在意志之维所要强化的气质和积极状态;其所具有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无私精神,正是人们在情感之维所需秉持的高尚情怀和道德情操。可以说,“四位一体”的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一个涉及“知、情、意、行”的精神总体,而且在具体层面上囊括理想追求、行为规范、道德情感、精神气质等多重维度。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有利于满足人们精神世界的迫切需要,而且为丰富人们的精神家园提供重要资源。

其次,在实践层面上,伟大建党精神一方面为“强党”提供了精神武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自己的精神武器。伟大建党精神在理论、文化和实践三重语境的交织中一经出场,就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开启伟大征程的精神航标和原始动力。伟大建党精神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引领力成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精神旗帜和思想纲领,其中知、情、意、行四个维度的层次性内涵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信仰指向,塑造和引导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价值信念,明晰了历史任务、根本动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界定了道德原则、行动指南,规范着党员干部的基本行为,保障了党内的政治风气和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确

立了党性原则、价值立场,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奋斗宗旨,有力提升党组织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历史和实践证明,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思想武器和精神之源,不仅在助推党的发展壮大和提升领导与执政水平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效力,为实现强党的宏伟目标贡献了精神伟力,而且经受住了伟大实践的淬炼,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成为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7]的重要精神支撑和动力。

另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为民族复兴注入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根到底都是聚焦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以其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在百年实践征程中不断锤炼党性与品质,洗礼思想与信念,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政治勇气,跨过不同时期的一个又一个难关,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艰巨任务,并最终“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8],从而决定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挑战,而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作用,继续为强国复兴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问题呈现: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必要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进入新发展阶段,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奋斗征程上,我们的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19]。这些多

层次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新的历史境域中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首先,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大国间的博弈和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特别是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隐蔽性地大搞“民主输出”,借助文学影视作品、游戏以及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进行“文化输出”,给我国发展和安全带来威胁。同时,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地区经济不平衡现象的加剧致使全球化进程遭遇梗阻,逆全球化声音不绝于耳,各种突发性的全球风险也日益频发,从而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从国内方面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也面临各类矛盾风险凸显期和爆发期,从时间维度上看,“既有过去长期存在而遗留下来的顽瘴痼疾,也有在解决旧有矛盾的过程中衍生出的新问题”^[20];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风险,也有外交、军事国防方面的矛盾风险,而且这些矛盾风险呈现出彼此交织、叠加出场的新态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1]。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类风险既需要物质发力,更需要精神的指引。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22],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一是以否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为旨归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时出场,抛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失灵论”等错误论调,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消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持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二是政治虚无主义的侵蚀。政治虚无主义是一种主张“淡化党员身份意识,逾越政治规矩;弱化党的引领力,瓦解政治保障;动摇理想信念,松懈政治定力;疏离党群关系,背弃政治立场”^[23],妄

图消解和抹杀党的成就和事业的错误思潮,其实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领域中的样态呈现,是一种政治上层建筑的虚无主义。近年来,政治虚无主义搭载智能化的传播媒介呈现出隐性渗透的崭新态势,部分党员干部思想防线疏松无形中受其裹挟和影响,逐渐背离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三是以“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24]为实质的“普世价值”,不时打着“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号宣扬和叫嚣西方制度的所谓优越性,一些缺乏甄别力的党员干部极易受其蛊惑,导致对党不够忠诚,政治立场动摇。

最后,党内出现一些错误观念。一方面,党内形式主义的数字化对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践行的挑战。形式主义一直是困扰党的建设的顽疾。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以刮骨疗毒的政治勇气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决心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并取得决定性成效。但形式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以数字化、电子化的形式再度登场,部分领导干部通过大搞“数字挂帅”“数字变通”“数字工程”来营造政绩假象,甚至借助微信等方式偷奸耍滑、“遥控”指挥。这些形式主义问题不仅有损党和国家的形象,而且也同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旨相悖,必然会使伟大建党精神的践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党内享乐主义的隐隐作祟对伟大建党精神践行的挑战。近年来,伴随着党和国家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取得,部分党员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和享乐主义的情愫,有的铺张浪费、挥霍无度,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这些享乐奢靡之风显然与伟大建党精神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人民利益。

三、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要求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不是根本目的,本质上更重要在于促使其从观念形态走向现实定在,释放其指导实践的磅礴伟力。同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面临的上述挑战,也决定了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绝不能停留于抽象的口号宣扬,而是

要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真正做到在外化于行中发挥指导实践的关键效力。因此,从机制之维制定恰当的弘扬与践行举措就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由浅入深,形成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教育引导机制。理论认知上清醒,实践笃行上才会坚定。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首先要形成教育引导机制,提升人们的理论认知。一是在教育内容上,既要从理论维度上实实在在的讲清楚伟大建党精神的内蕴涵、核心要义、基本特征以及其与作为具体环节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回答好“是什么”的问题;也要在历史维度上,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历史进程,讲清楚“从何来”和“如何来”的问题;还要在现实维度上,将伟大建党精神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精神理论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独特优势,阐释好“怎么样”的问题。二是教育方式上,既要“活化老办法”,在启发式和引导式“灌输论”的指导下柔性地输出思想内容,增强人们的理论接受度;也要“善用新办法”,学会注重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活动,以现代化的方式形塑公众认知,增强教育效果。在教育载体上,既要注重丰富伟大建党精神教育的实践载体,如建好用好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红色基地、历史博物馆和纪念馆等,以此使人们更切身地领会和感受伟大建党精神;也要注重拓展文化载体,通过编纂相关通俗读物、拍摄影视作品等方式宣扬伟大建党精神。

其次,由点到面,完善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传播机制。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传播,只有讲好伟大建党实践的故事,传递好伟大建党精神的声音,才能确保伟大建党精神真正的内化于心,进而外化于行。如果伟大建党精神不能得到有效传播,“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会变成一句毫无力量的空话。因此,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具体展开上必须要形成科学的传播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新闻媒体来说,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

要”^[25]。毋庸讳言,这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来说也同样适用。一是要形成伟大建党精神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立足于新时代党情国情世情,围绕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百年进程,从广度和深度上着力将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和灵魂作为主导传播内容,不断增强内容的穿透力和理解力。二是形成伟大建党精神传播的话语创新机制。一方面,在话语方式上要坚持理论灌输与情感渲染并重,宏大叙事和微叙事耦合,“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单调生硬’为‘丰富生动’、变‘传统说教’为‘时代表达’”^[26],不断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在话语载体上,既改造传统媒体,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关键效力;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和旗舰媒体,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优势互补、同频共振和深度融合中延展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力。三是形成伟大建党精神传播的手段创新机制。一方面运用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实际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传播工作,特别是积极引入智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图像化、动态化、通俗化的形式立体化、形象化传播;另一方面也把握好时效度,充分利用好中共党史上的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纪念日进行情感渲染和情景再现,从而不断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感染力。

再次,由表及里,塑造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思维指导机制。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7]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方法策略上必须要塑造思维指导机制。一是树立系统思维。一方面以系统思维处理好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中,在红色精神的历史长河中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定位和根本要义,从而把红色资源作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教材,讲好伟大建党故事,“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8]。另一方面把伟大建党精神嵌入到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既将伟大建党精神嵌入到党的建设具体过程中去,形成由上到下、由中央到地方

的纵向贯通机制,从而不断推进党的建设质量的提升;也将伟大建党精神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形成从政治到生态的横向拓展机制,从而不断推进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二是要树立法治思维。新时代党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多方面的,必须通过树立法治思维和加强法治建设来筑牢保障之网。为此,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出台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备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全方位把控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环节,从而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从政党的角度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内法规体系,发挥法纪法规约束和指导实践的作用,确保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理念积极转化为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动力。

最后,由一到多,构建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协同落实机制。马克思曾言:“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9]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既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更需要主体力量的发挥。一方面,发挥领导性主体的带头作用。“群雁高飞头雁领,船载千斤靠舵人”。在任何一支飞行的大雁队伍中,起关键作用的都是头雁,因为头雁决定前进的方向、决定队伍的前途命运。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和领导性主体,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中发挥“头雁效应”,做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在践行伟大建党精神上作好表率当好标杆。另一方面,发挥参与性主体的协助作用。如果说党员干部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领导性主体,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参与性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30]。为此,必须要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人民群众的具体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从而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贡献人民群众的主体伟力。

[参考文献]

- [1][法]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5.
- [2]张志丹. 伟大建党精神的多维诠释[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 (7).
-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G].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29, 313.
- [4][5][11][13][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539, 503, 525, 320.
- [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3.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2.
- [10]列宁选集: 第4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9.
- [12][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34.
- [14][15]白显良. 基于四重逻辑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 (13).
-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G].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531.
- [18]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364.
- [20]徐国亮. 恩格斯的矛盾观及当代意蕴[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
-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85.
- [22]毛泽东文集: 第7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85.
- [23]王磊, 王进芬. 党内政治虚无主义: 主要表现、现实危害及纠治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 (11).
- [24]卫兴华. 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J]. 理论导报, 2015, (12).
- [25]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00.
- [26]王岩. 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 (7).
-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7.
- [28]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J]. 求是, 2021(10).
- [30]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46.

(责任编辑 德 祥)

The Logical Premise, Inner Reason,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LI Zheng LIU Jianjun

Abstract: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s the source of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derives and nurtures the spiritual lineages as a specific link and special form,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CPC "can" from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requires to follow the route from "knowing" to "doing," illustrate where it comes—the generative logic as the logical premise, explicate the inner reasons for the promotion, and design measures for promotion that fit the specific commitments and realistic route. Only by transforming the theoretic power of "explaining the world" of the great spirit into its realistic power can in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its true essence and fundamental purport be grasped, so as to spiritually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projects and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Logical Premise, Inner Reason, Practical Requirements